

20世纪 5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

——从欧米加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兰 岚

内容提要 艾森豪威尔主义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中东政策,旨在引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参与其全球遏制战略,共同抵御苏联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它构成了其后几十年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在欧米加计划不能有效处理中东问题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对欧米加计划的公开阐明,这突出体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连续性。

关键词 欧米加计划 艾森豪威尔主义 美国中东政策

1957 年 1 月 5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中东政策特别咨文”,强调“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正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为抵御此种威胁,美国应与中东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合作,对之进行经济、军事援助,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美国军队¹。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之后,国会通过了有关此项咨文的决议案,并于 3 月 9 日经总统签署正式生效。这一以“总统咨文”及相关决议案为形式的美国中东政策,便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Eisenhower Doctrine)或“中东主义”(Middle East Doctrine)。

传统观点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在苏伊士危机之后,美国为了夺取英法的殖民地位、遏制苏联向南扩张而出台的。国外研究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述不胜枚举,英国历史学家对此尤为赞同。1957 年曾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编辑有关苏伊士危机文件的唐纳德·瓦特指出,“美国乐于运用其政治优势而不在乎要对殖民国家表示尊重、忠诚、尽义务或者与其一致的感情”^④。英国第一位对苏伊士事件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休·托马斯说,美国在中东“没有传统的利益,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商业关系。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早已逝去的殖民经历,可以同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④。史蒂文·弗赖伯格把英美在苏伊士问题上的摊牌看做是美国把英国赶出阿拉伯世界以及打

¹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在中东的政策:1956 年 9 月—1957 年 1 月》(*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Sept. 1956 - Jun. 1957*)第 25 卷,华盛顿 1957 年版,第 15—23 页。

^④ 唐纳德·瓦特:《接替约翰牛:英美易位,1900—1975 年》(*Donald Cameron Watt Succeeding John Bull: Britain in America's Place, 1900 - 1975*),剑桥 1984 年版,第 43 页。

^④ 休·托马斯:《苏伊士事件》(*Hugh Thomas The Suez Affair*),纽约 1967 年版,第 17 页。

开中东市场、获取商业利益的计划的高潮,在他眼中,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是“被用来在这一地区取代英国的”¹。罗伯特·舒尔津格的想法也相似,他认为“苏伊士事件使美国第一次力求取代英法成为中东的主要外来势力”^④。我国史学界基本采纳了这种看法,在阐述那些导致英美易位的历史事件时,重点强调了美国排挤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动机^⑤。杨冬燕也认为,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可谓是英美中东关系的一个分水岭,英法想要继续霸住苏伊士运河,结果反而被挤出中东;挤走它们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盟友美国^{1/4}。

近些年解密出版了一批档案文献,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文件》第18—21卷(2001年版)、《艾登—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5—1957年》(2005年版)和《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7—1969年》(2005年版)^{1/2},它们都是研究艾森豪威尔主义以及20世纪50年代英美关系的重要史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解读,作者发现传统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虽然英国和美国确实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总体目标并不是要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恰恰相反,艾森豪威尔对于英美联盟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认为这是国际稳定所必不可少的,通过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维持亲密的个人友谊、与英国定期磋商并进行防务合作,使英美关系得以修复。在中东问题上,两国也达成了合作的共识。可以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突出特点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异性。要深入理解这一点,必须从对欧米加计划的具体考察开始。

一、欧米加计划出台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进入中东地区的一个关键时期,冷战的扩大使美国对中东的重视程度有了一个新的提升。对中东而言,1953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相当深刻的意义,因为中东与朝鲜一样,被视为具有明显的战略和经济价值而又十分脆弱的地区^{3/4}。对此,美国的认识是,均势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那些即使在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领土损失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将导致进一步的损失,并最终影响到西方国家在欧洲和亚洲的关键利益^⑧。

对于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50年8月担任北约总

¹ 史蒂文·弗莱伯格:《苏伊士真相:美国在中东力量的崛起,1953—1957年》(Steven Z. Friedberger *Dawn Over Suez: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1953—1957*),芝加哥1992年版,第2页。

④ 罗伯特·舒尔津格:《苏伊士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1957—1958年》(Robert Schulzinger “The Impact of Suez on US Middle East Policy, 1957—1958”),塞尔温·特洛恩、摩西·舍默施编:《苏伊士—西奈危机》(Selwyn Ilan Troen and Moshe Shemesh ed. *The Suez-Sinai Crisis*),伦敦1990年版,第250页。

⑤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385页。

^{1/4} 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2} 路易斯·加拉姆波斯、当凡埃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文件》(Louis Galambos and Daun Van Ee ed., *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第18—21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彼得·G.波尔勒编:《艾登—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5—1957年》(Peter G. Boyle ed., *The Eden-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 1955—1957*),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布鲁斯·吉尔赫德、安东尼·O.埃德蒙兹编:《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7—1969年》(E. Bruce Geelhoed and Anthony O. Edmonds ed., *The Macmillan-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 1957—1969*),麦克米伦出版社2005年版。

^{3/4} 巴里·鲁宾:《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冲突》(Barry Rubin *The Arab States and the Palestine Conflict*),塞拉库斯1981年版,第217页。

⑧ 菲利普·格罗塞尔:《美国与中东》(Philip Gross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纽约1982年版,第23页。

司令时,他就指出,“在战略上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了,我们应该设法把阿拉伯世界拉到我们一边”¹。在美国政府的考虑层级中,经济因素是从属于战略因素的。虽然美国有自己的石油资产,并不像西欧那样极大地依赖于中东石油^④,但艾森豪威尔却深知中东石油对其北约盟国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正如他曾承认的,如果这些供应被切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将迅速崩溃;如果欧洲经济崩溃,美国将处于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困境^⑤。显然,在美国维持西欧复兴和遏制苏联扩张的企图,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同时,美国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有着矛盾的心理。虽然从原则上来说,拉拢民族主义领导人需要尊重中东国家的政治独立,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担心,英国力量的太快撤出会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苏联的影响,这将使美国不得不进入中东地区填补力量真空。对于一个努力控制政府开支且专注于更紧迫的冷战问题的政府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前景。因此,理想的方式是,让英国自己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一个权宜之计,使其仍然是这一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大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指出,虽然存在着美国在中东全面取代英国势力的趋势,但是不能低估英国在该地区保卫西方安全利益的能力^Ⅱ。这样来看,美国的中东政策并非意在取代英国,而是为了弥补英国日益下降的影响,并且利用其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来阻止苏联南下,从而巩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东石油资源和战略位置的控制。

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的陪同下,对中东进行了“事实调查旅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巨大影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调查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促进地区稳定、阻止苏联渗透和保证石油正常输出的基本方针。在具体实施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指出,有两个问题需要美国加以关注:即英国和埃及关于苏伊士基地的谈判僵局和阿以冲突,一旦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中东民族主义者将迅速转向反对苏联的威胁。

推动英国和埃及关于苏伊士基地的谈判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第一次考验,即是否可以通过迁就埃及自由军官组织的某些目标、改进英国的中东存在来推进其遏制战略。1954年7月27日,《英埃条约》得以签订,规定英国军队撤离苏伊士运河区,但是一旦发生区域外力量对埃及、阿拉伯联盟或土耳其的武装进攻,英国有权重返苏伊士军事基地并使用其设施^Ⅲ。然而,随着条约的签订,美国平衡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的行动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此时,中东地区出现了三个拥有不同目标的权力竞争者:英国寻求积极发展伊拉克—约旦轴心来代替埃及,考虑的是复兴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美国出于遏制战略的考虑,将重点放在解决阿以冲突之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埃及的长期支持;而埃及在摆脱了苏伊士基地的束缚和限制之后,其目标在于获得地区优势,这需要否定英国的伊拉克—约旦轴心以及否定美国将遏制战略强加于阿拉伯世界。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在《英埃条约》签订之后逐渐浮出水面,为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埋下了伏笔。

同时,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也遇到了严重的挫折。1954年12月,英美联合制定了一个名为阿尔

¹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④ 据1946年的规划,到1951年西欧国家将从中东进口石油80%。到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年就职时,北约国家从波斯湾获得75%的石油。丹尼尔·叶尔金:《奖赏:对石油、金钱和权力的长征》(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纽约1991年版,第425页。

^⑤ 史蒂文·斯皮杰:《阿以之间的另一种冲突》(Steven 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芝加哥1985年版,第55页。

^Ⅱ 基思·威洛克:《纳赛尔的新埃及》(Keith Wheelock, *Nasser's New Egypt*),纽约1960年版,第31—34页。

^Ⅲ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54年7月28日。

法 (Alpha) 的秘密计划, 要求结束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交战状态; 向以色列遣返 75000 名难民, 通过国际努力对其余难民进行赔偿; 要求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地区做出领土让步, 使耶路撒冷成为国际保护的圣地。作为对这些让步的回报, 西方国家将对以色列的边界做出保证并说服阿拉伯国家结束对以色列的经济封锁¹。然而, 这一计划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即在西方大国的目标和地区国家的倾向之间有着重大的分歧。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通过承诺推进埃及的地区领导权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来获得埃及在全球遏制战略中的合作; 然而埃及实现地区野心的方式却是通过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谴责伊拉克与西方的合作来获得阿拉伯民众的支持, 它根本不愿意在一个有缺陷的英美框架中实现与以色列的和解, 认为这无疑会损害其号召力; 阿尔法计划对以色列来说也没有吸引力, 总理本-古里安指出, “以色列不会考虑包括任何领土让步的和平建议。邻国没有权利获得以色列的任何一英寸土地”^④。这样, 阿尔法计划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当暂时性的合作没有能够使埃及支持美国的遏制战略时, 艾森豪威尔政府便转向了强制政策。美国希望, 通过逐渐升级的惩罚性措施, 能够使纳赛尔转向与西方合作, 或者至少使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边缘化, 从而不至于影响美国的遏制战略。这一渐进的强制政策就是欧米加计划 (Omega Plan)。

二、欧米加计划的提出与实施

1. 欧米加计划的内容

1956年3月28日, 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欧米加计划。计划包括三个连续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在时间上都有明确的限制, 通过渐进的措施来影响埃及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地区形势。其目的在于, “让埃及总统纳赛尔上校意识到, 在他与苏联合作的同时不可能享受来自美国的最惠国待遇”, 但是, “在眼下, 我们仍希望避免任何把纳赛尔不可挽回地推向苏联卫星国地位的公开分裂,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们还想为纳赛尔留下一道恢复与西方友好关系的桥梁”^(四)。

第一阶段截至 1956 年 4 月底, 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采取各项措施以逐步影响埃及的经济地位和地区形势, 包括: 延迟缔结当前有关阿斯旺水坝的谈判, 重新分配本已拨付水坝计划第一阶段的资金; 延迟颁发适用于武器购买的出口许可证; 延迟批准明显用于埃及军队的贸易物资出口^{1/4}。美国认为, 如果进展理想的话, 上述措施将迫使埃及重新思考其反西方立场; 如果不理想的话, 则可以着手“更激进的行动”^{1/2}。

第二阶段截至 1956 年 6 月底, 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各种措施。在经济领域, 美国将不再是拖延各种计划, 而是“取消任何现有的资助埃及经济发展的支出”。另外, 削弱埃及的地区盟友, 并且树立支持美国的其他权力中心, 以侵蚀埃及的地区地位。艾森豪威尔指出, “美国应该考虑树立沙特国王作

¹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 1955—1957年》(FRUS, 1955—1957)第 14 卷, 华盛顿 1989 年版, 第 35—42 页。

^④ 摩德差·巴昂:《加沙之门: 以色列迈向苏伊士之路及其后, 1955—1957》(Mordechai Bar-On, *The Gates of Gaza: Israel's Road to Suez and Back 1955—1957*), 纽约 1944 年版, 第 89 页。

^(四)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 1955—1957年》第 15 卷, 华盛顿 1989 年版, 第 419 页。

^{1/4} 路易斯·加拉姆波斯、当凡埃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文件》第 19 卷, 第 17 页。

^{1/2}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 1955—1957年》第 15 卷, 第 420—421 页。

为一个其声望足以抵消纳赛尔的人物”¹。

第三阶段,继续孤立埃及并向其施加压力,但重点却是更直接地针对埃及的内部事务。美国将永久搁置对阿斯旺水坝的资助,中止所有能够援助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合作性财政安排,“与埃及的政治反对派建立联系并谨慎地加以鼓励”。美国希望,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总体效果将是“在近东和非洲限制埃及的影响和行动,并在埃及国内削弱纳赛尔政权”^④。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观点来看,欧米加计划是渐进的,将每一个阶段分隔开来以允许纳赛尔调整政策。美国希望,通过系统地削弱埃及的经济及其地区地位,自由军官组织将按照美国的意愿来行动。即使埃及继续顽固不化,欧米加计划也可以用来限制埃及挫败美国中东政策的能力。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欧米加计划是渐进的,但是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还是准备通过扶植埃及的国内反对派来强制纳赛尔政权发生政策转向。

在设计欧米加计划时,美国承认了与英国合作的重要性。然而,英美观点在许多问题上仍有相当的分歧。从一开始,英国领导人就对埃及的转向不抱什么希望。英国外交部的报告说,“不管我们追求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必须期待着来自纳赛尔上校的持续且渐增的敌意”。英国认为,欧米加行动的渐进主义与埃及对西方在中东的长期利益所造成的重大威胁是不相称的,因此它更赞成对巴格达条约做出一个更为明确的承诺,将这一组织作为西方存在的主要支柱。外交部的报告强调,“应该给予巴格达条约及其成员国更多支持,尤其是伊拉克”^⑤。虽然美国准备给予巴格达条约组织更多帮助,但它仍不愿正式加入这一组织。美国对以色列可能做出的负面反应表示担心,更愿意将其战略奠定在沙特阿拉伯之上。最终,这些分歧导致英国对欧米加计划的耐性完全消失,它走向了另一条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政策,即通过与法国和以色列的勾结来消除埃及的威胁。

2. 欧米加计划的实施

在欧米加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中,美国延迟了对埃及的所有经济援助计划。埃及当然有所察觉,但它并没有从既定立场上后退,而是进一步动员阿拉伯世界的支持。1956年4月,纳赛尔邀请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访问开罗,并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联盟。对美国国务院来说,这次会晤又一次暗示着埃及正在鼓励“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对西方的恶意攻击和对以色列的挑衅态度”^⑥。不过,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也认识到,美国的意向可能会给其地区地位和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努力与美国大使馆和情报部门接触,以阐明其立场。在与美国驻埃及大使拜娄德的私下会晤中,纳赛尔强调,埃及决心与苏联集团保持独立,专注于自治。关于美国正在施加的压力,纳赛尔声称,它不可能成功,因为“这只会增加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据此,拜娄德向国务院报告说,欧米加计划并没有带来预期的转向,因为在面临这些压力时,“纳赛尔可能会增加他对苏联的依赖”^⑦。但是美国高层官员仍然认为,通过施加各种手段,他们能够实现其预想。

欧米加计划的第二阶段从1956年5月初开始实行,美国加强了许多既定措施,暂停了对埃及的

¹ 路易斯·加拉姆波斯、当凡埃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文件》第19卷,第17—18页。

^④ 路易斯·加拉姆波斯、当凡埃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文件》第19卷,第18页。

^⑤ 安东尼·艾登:《安东尼·艾登爵士回忆录》(Anthony Eden *The Memoirs of the Rt Hon. Sir Anthony Eden*),伦敦1960年版,第431页。

^⑥ 路易斯·加拉姆波斯、当凡埃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文件》第19卷,第19页。

^⑦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15卷,第557—558、559页。

所有经济援助计划,同时争取地区盟友并孤立埃及。埃及的反应再次超出了美国的预期,革命指导委员会不仅通过动员阿拉伯民众舆论来向西方表示抗议,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与东方集团的联系。1956年5月16日,埃及宣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承认。杜勒斯将此描述为“一掌打在美国脸上”,他警告埃及驻美国大使侯赛因说,“纳赛尔已经和魔鬼做了一个交易,希望发展自身力量以建立起一个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帝国”。美国行动协调局承认,虽然欧米加计划继续进行,但是“在实现目标方面并没有多少进展”。不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追求其既定路线,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说,虽然有目前的挫折,“中东形势非常易变的,并且高度反复无常”,但是成功地实施欧米加计划仍有希望,因为第二阶段“还没有自然展开”¹。

3. 苏伊士战争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尽在美国官员的掌握之中,关于援建阿斯旺水坝的问题使欧米加计划逐渐偏离了原定的方向。在前两个阶段,美英政府已经同意推迟援建阿斯旺水坝的谈判,以“使纳赛尔仔细考虑他对西方的立场”^④,其后的一些发展更使杜勒斯认为,美国应该完全撤出这一工程,但是他希望避免公开宣布退出,因为直到欧米加计划的第三阶段美国才会官方中止援建计划。不过,国会政治的因素逐渐增大,因为南方参议员不愿资助与其选区有直接竞争的埃及棉纺业^(四)。1956年7月19日,杜勒斯与侯赛因举行会晤,以埃及经济虚弱为由,取消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的提议,英国和世界银行也随之照办^{1/4}。在私下里,英国外交部指出,撤销援建阿斯旺水坝的提议,其目的在于“鼓励那些不希望与西方发生争吵的埃及国内反对派”,以削弱纳赛尔政权^{1/2}。纳赛尔对此勃然大怒,他宣称,“这不是撤回。这是对政权的攻击和打倒政权的邀请”^{3/4},埃及需要一个大胆的行动来维持其在阿拉伯世界的优势并维护其民族主义信用。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对广大群众进行演讲时,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公司进行国有化,以运河通行费来资助阿斯旺水坝的建设。这一决定受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欢迎。

在考虑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的回应时,美国很快排除了武力的使用。艾森豪威尔认为,鲁莽地诉诸武力只会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壮大,因为这将证实埃及长久以来的声称,即西方大国只是重新塑造其殖民存在。他还警告说,军事力量的使用“很可能使从达卡至菲律宾群岛的世界团结起来反对我们”。在决定不采取军事措施的情况下,美国承认了继续实施欧米加计划的重要性,这一计划的第三阶段变得清晰起来。国务院强调说,“美国 and 英国应该立即实施旨在削弱纳赛尔作为中东力量的政策”^⑤,这意味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埃及的地区影响以及侵蚀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国内权力基础。

¹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15卷,第67Q 645—65Q 677页。

^④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15卷,第419页。

^(四) 彼得·哈恩:《美国、英国和埃及,1945—1956》(Peter L. Hah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Egypt, 1945 - 1956*),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1/4} 汤森·胡伯斯:《魔鬼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波士顿1973年版,第330—344页。

^{1/2}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15卷,第814页。

^{3/4} 穆罕默德·海卡尔:《砍掉狮尾:埃及人眼里的苏伊士》(Mohammed Heikal *Cutting the Lion's Tail: Suez through Egyptian Eyes*),纽约1987年版,第70页。

^⑤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16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69—7Q 356—357页。

英国并不赞同美国的立场,它是在一个更为僵硬的框架中来认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的。负责外交事务的次官柯克帕特里克警告说,如果埃及成功的话,将会有一个黑暗的未来,“在两年时间内,纳赛尔将剥夺我们的石油,英镑区崩溃……我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到南斯拉夫人和埃及人的水平”¹。英国内阁成立了一个以艾登、索尔兹伯里和麦克米伦为首的特别埃及委员会,仔细制定了应对计划。委员会明确指出,英国的目的是“推翻埃及现政府”^④。艾登越来越对欧米加计划不耐烦了,认为这一耐心、审慎的战略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⑤。英国决定与美国分道扬镳,转而与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对埃及进行军事打击。10月29日,以色列开始入侵埃及。30日下午,英国、法国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31日,英国、法国以埃及拒绝最后通牒为由,出动飞机轰炸埃及。11月5日,英国、法国的伞兵部队在埃及登陆,苏伊士战争全面爆发,欧米加计划的实施被打断了。

三、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苏伊士战争是中东历史上的一场政治大地震,给美国决策者呈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英法在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基本上结束了在中东的殖民统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权力真空的出现;如果美国不去填补这个真空的话,那么苏联就会乘虚而入。基于此,美国再次对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

美国并没有把苏伊士战争看成是把英国逐出中东的机会。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虽然美国也许在未来必须接受一个更大的地区角色,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措施,英国的参与将最终恢复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在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后,杜勒斯向劳埃德保证,“这一阶段将为重新建立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密切关系打下基础,我们将在英国当前的困难中尽其所能地给予货币援助”^⑥。美国希望恢复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利用其残存的设施和影响,为其全球遏制战略的总体目标服务。

恢复英国的地位并不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唯一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建立起阿拉伯君主国家之间的同盟,将之与美国直接联系在一起。加强相关国家的内部结构,“推动建立起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一个北非联盟,作为对埃及的抗衡”,其目标是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在伊斯兰、阿拉伯和非洲的范围内孤立埃及并减少其影响^⑦。

1956年11月21日,代理国务卿小胡佛向艾森豪威尔呈交了一份概述美国未来中东政策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小胡佛提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目标:防止苏联得到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和战略位置;保持西方对这些资源的获得。小胡佛还概述了行使这一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措施:短期措施旨在清除地区摩擦的直接来源,如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重新开放运河和修复经过叙利亚的输油管道、恢复解决阿以争端的努力、“减少沙特阿拉伯对于叙利亚和约旦的极端分子的财政支持”等;长

¹ 伊夫林·沙克贝勒:《降临苏伊士:日记,1951—1956年》(Evelyn Shuckburgh *Descent to Suez: Diaries, 1951—1956*),纽约1987年版,第360—361页。

^④ 安东尼·艾登:《安东尼·艾登爵士回忆录》,第447页。

^⑤ 斯科特·卢卡斯:《我们的分歧:英国、美国和苏伊士危机》(W. Scott Lucas *Divided We Stand: Britain, the US and the Suez Crisis*),伦敦1991年版,第207—286页;基思·凯尔:《苏伊士》(Keith Kyle *Suez*),伦敦1991年版,第291—425页。

^⑥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16卷,第1121、1281页。

^⑦ 杰弗里·拉夫贝维尔:《美国和埃及:在北非的对抗与合作,1956—1960年》(Jeffrey Lefebv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gypt Confron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Northeast Africa 1956—1960”),《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1993年4月号,第329—331页。

期措施则是决心削弱纳赛尔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美国应该“利用所有适当的机会来孤立埃及和削减纳赛尔的声望和影响”,“进一步加强沙特阿拉伯的力量并减少它与埃及的联系”,并且“可能的话推动成立伊拉克领导之下的联盟”¹。在此基础上,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了美国关于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艾森豪威尔主义正式出台。

综上所述,艾森豪威尔主义是欧米加计划的公开阐明,其主要内容早在苏伊士危机之前就已经提出并加以应用。欧米加计划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来削弱埃及的经济和地区地位,使其发生政策转向,引导埃及民族主义加入美国的地区联盟网络,为遏制苏联的全球目标服务。就美国的中东政策而言,苏伊士危机只是一个附带事件,它打断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秘密削弱纳赛尔及其激进盟友的政策。在整个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将欧米加计划作为说服英国不要使用武力的一个手段。美英一致认为纳赛尔正在妨碍西方的事业,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才是对付纳赛尔的最佳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苏伊士危机既不应该被看做美埃关系的顶点,也不应该被视为导致美国在中东的立场完全不同的重大事件。过分强调苏伊士危机,会导致我们忽略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在美国将英国重新纳入地区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注视着冷战需求的政府,它在保留英国的中东存在上看到了更多的价值,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希望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英国在中东的剩余影响作为推进其冷战日程的手段。这样,美国进行的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行动,既维持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存在,同时又寻求引导地区民族主义的力量。为了实现其总体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诱使英国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然而这一任务并不总是容易的,因为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他们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可能与美国的看法相冲突。有时,英国会进行单方面行动,使美国的政策实施变得更加困难,苏伊士战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说,利益汇合还是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保持了与英国的联盟关系,使之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

另外,在苏伊士危机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寻求恢复其盟友英国的地位,而且诱使阿拉伯君主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集团。显然,困境重重的阿拉伯君主国家并不倾向于在纳赛尔成为这一地区的民族自决化身时与之对抗。艾森豪威尔主义通过更公开的援助承诺、保证稳定的美国支持和加强这些国家的国内结构,来消除他们的恐惧。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完全进入了围绕中东霸权的地区内部争斗,试图以积极扶持阿拉伯君主国家作为其中东影响的基石,这使之成为了中东冷战的一个参与者,这一发展加剧了阿拉伯内部的紧张关系并进一步使中东地区走向动荡。从这一刻起,一连几任美国政府都对中东的革命国家表示怀疑而维持与君主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盟关系,这实际上也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最为持久的遗产,为其后30年的美国中东政策路线定下了基调。

[本文作者兰岚,海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海口 571158]

(责任编辑:郭子林)

¹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16卷,第1223页。

society. In a word, the “Six-Day War” has not only fully proven modern warfare’s multiple functions and the multiple consequences, but also has provided a model case for the research of war-and-society relations.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1950s— From Omega Plan to the Birth of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Lan Lan

As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the 1950s,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imed to integrate some Arab states into its coalition of global containment, fend off Soviet penet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 have been the foundation of its Middle East policies thereafter.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was formed because Omega Plan could not tackle the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 effectively. It is an open clarification of the Omega Plan, which emphasiz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ies.

A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of Nixon Administration

Xia Zhengwei Xu Anchao

During Richard Nixon’s presidency, environmental issue became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Through such frameworks as NATO, OECD,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ixon Administration adopted a series of diplomatic actions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harnessing. Nixo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reflected his pioneering diplomatic concept and concrete ac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executed the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ahead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fore the Americans took an advantaged position in the field. Henceforth,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field was promoted and reached its zenith in early 1970s. However, mainly focusing on Americ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ituations as well as realistic national interests, Nixo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couldn’t help make environment diplomatic policies from the angl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ice Proble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State Regulation

Chai B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problem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long-term regulation of price resulted from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the 16th century. By numerous royal proclamations, the Tudor State reinforced price control and gained certain positive effects. However, restricted by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ts actual effect is quite limited.